

缓和与 1973 年中东战争的爆发

刘合波

(南开大学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天津 300071)

摘要:缓和是冷战时期的特定阶段,美苏对缓和的认知影响了双方在中东地区的政策及解决中东危机的进程。1973 年中东战争的爆发,既与美苏对缓和的认知与推动有关,也离不开埃及对缓和的追求。美苏缓和虽缓解了彼此间的紧张关系,但由于美苏对缓和的追求漠视了埃及的缓和努力与阿拉伯国家对被占领土的诉求,这成为促发战争爆发的外源性因素。美苏缓和对阿以僵局的维持,埃及缓和外交的失败与以色列的强硬立场,使萨达特放弃了外交努力而发动了斋月战争。

关键词:缓和;阿以冲突;斋月战争;冷战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0)05-0057-07

19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美国深陷越南战争而带来的自身实力的下降与苏联的经济停滞及中苏关系的破裂,使两个超级大国都有了缓和彼此紧张关系的意图。尽管美苏缓和不能代表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的全部,但却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它直接影响了地区冲突的和平进程,这在中东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目前学界对缓和已有广泛的研究:在内容上,这些研究多以缓和为背景来分析 19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的国际关系,其中主要集中于东西方之间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在研究视角上,大多数研究成果侧重于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对缓和的缘起、背景、进程及结果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尽管这些研究大都涉及到了缓和背景下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但很少是从美苏对缓和的认知与追求、埃及对缓和的诉求等角度对 1973 年中东战争的爆发进行分析。¹

本文将通过阐述美苏对缓和的认知及其影响下的中东政策、埃及对缓和的追寻,并结合新的解密文献与研究成果,来分析美苏缓和、埃及缓和策略的失败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之间的关系。

一、美国对缓和的认知

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中,缓和既是冷战时期的一个特定阶段,也是一个过程。作为一个阶段,主要是指美国总统尼克松时期至卡特任期结束前的国际关系;作为一个过程,它主要是指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国家抛弃彼此持续的对抗关系而转向整体合作的方向或轨道。这种紧张关系的缓解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条件:一是认识到其政治、经济力量在全球的局限性;二是各方对“敌人”的认知的改变;三是认识到通过与对手的部分和解来提高自身地位的必要性^[1] (P1)。美苏正是基于以上要素而趋向缓和。

收稿日期:2009-03-15

作者简介:刘合波(1973—),男,山东新泰人,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¹ 缓和(D tente),这一从字面上可理解为“紧张的缓解”的法语词汇,很久以来就被用于外交领域,以此代表国家间紧张关系的缓解。关于缓和的著述繁多,其中涉及美苏对缓和的认知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关系方面的著述主要有:Raymond L. Garthoff, D tente and Confrontation: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from Nixon to Reaga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5; Cecil V. Crabb, J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Nuclear Age,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1983; Vladimir Petrov, US-Soviet D tente: Past and Future,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75; Foy D. Kohler, Leon Gour, Mose L. Harvey,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October 1973 Middle East war: the Implications for D tente, Coral Gables, Fla.: Center for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ami, 1974; Adam B. Ulam, D tente under Soviet Eyes, Foreign Policy, No. 24, Autumn 1976.

尼克松之前的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总统都曾试图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尤其是肯尼迪,在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之后,意识到大国之间核对抗的危险性,在1963年提出了对苏缓和。但肯尼迪所提到的缓和,是用来描述美苏紧张关系的缓解过程,还不是一种战略^[2](P289)]。尽管从艾森豪威尔到肯尼迪时期,遏制与对抗一直是美国对苏政策的主旋律,与苏联对话与合作也是相当有限的,但到1960年代,对苏采取竞争与对抗、合作与相互克制的双重途径,实际上已成为美国政治上的必须^[3](P433)],越南战争促进了这种外交态势的转变,为尼克松政府重新制定美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契机。

在尼克松政府的外交政策中,缓和的提出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尼克松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提到将用对话、谈判和合作代替对抗,其中尽管没有提及缓和,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尼克松政府外交政策的端倪^[4](P3)]。在1970-1972年向国会提交的外交政策年度报告中,尼克松用了许多用以标识改善美苏关系的概念,如“新时代”、“相互包容”、构建“和平框架”、“持久和平”、“和平共处”、“行动准则”等。1973年,尼克松在第四次外交政策年度报告中宣称:在由美国占主导的两极世界向共同分担责任的多极世界过渡的过程中,美国所追求的是一个稳定的结构,而非均势。而这种可靠的稳定包括对对手的克制与自我克制。缓和的确改善了两国的关系,但缓和并不意味着危险的结束,也不代表持久的和平与竞争的结束^[5](P517-518)],这基本明确了缓和的内涵。基辛格认为,尼克松的对苏缓和政策,是将美苏关系纳入一个既非全面对抗也非完全妥协的全然之道,利用合作作为杠杆来调整苏联在美苏抵牾之处的行为,即利用联系原则来解决问题。但在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问题上,尼克松与艾奇逊和杜勒斯的观点并无二致,只是方法上有所不同^[6](P714)]。此外,基辛格还认为,在地缘政治上,特别是在中东地区应加强与苏联的争夺^[7](P99)]。因此,尼克松政府的缓和政策更多的是在手段上而非在目的上的转变。尼克松—基辛格既没有抛弃苏联对美国安全威胁的深层关注,也没有放弃传统的遏制目标,其中的区别在于:此前的遏制政策是美国实力的显示,而尼克松—基辛格的遏制则是承认美国的衰弱;尼克松政府之前的遏制政策主要是依靠美国的实力与苏联的谨慎,而将来遏制则依靠苏联的克制,以使美国衰弱与意志丧失的后果最小化^[3](P434-435)]。

从美国对缓和的认知来看,缓和并不代表美苏

敌对关系的结束;从严格意义上,它仅意味着拒绝用战争和以战争相威胁作为解决两国冲突及达到其特殊目的的终极手段。尽管美苏两国都认为他们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双方各自的目的也是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的;尽管谈判也的确意味着自我克制、持续与积极的外交互动,但谈判并不排除运用政治、经济压力或利用其他地区 and 国家的有利发展而损害其对手^[1](P1-2)]。因此,在美国对缓和的认知中,缓和包含着竞争与对抗;缓和是如何利用有效的机制来限制对手,并以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从1969年尼克松就职至1973年斋月战争爆发,尼克松政府的缓和观对美国的中东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与苏联在缓和基础上进行争夺,这主要表现在美国在处理阿以冲突中对苏联的排挤。美国在中东的一个重要理念是要排挤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和势力。尽管苏联在六日战争后曾参与了联合国242号决议的磋商、在尼克松就职后曾与美国探讨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阿以冲突等问题,但无论是最初的动议还是最后的决议基本上是美国意图的反映,苏联的建议及其反映阿拉伯国家意图的立场均未得到美国的支持。自尼克松上任以来,美国提出了1969年12月、1970年8月的罗杰斯计划、支持1971年恢复的联合国特别代表雅林主持的会谈等一系列试图解决阿以冲突的方案。虽然这些方案除了1970年8月的罗杰斯计划取得了短暂的成功外,其他均以失败告终,但苏联一直是这些方案的被动参与者,苏联的建议也基本被排除在外,在事实上将苏联解决中东问题的作用边缘化。1973年初,已从越南战争问题中脱身的基辛格开始考虑他的中东战略。尽管基辛格试图在中东危机的解决中得到苏联的合作,但他的目的是希望借1972年埃及驱逐苏联顾问的机会,来说服苏联人接受他的一套解决阿以冲突的原则,以进一步削弱苏联在中东的势力及影响^[8](P156-157)]。在1972年5月、1973年6月美苏两次首脑会晤中,尽管苏联提出了自己解决阿以冲突的方案,但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相反却接受了美国维持现状的建议,这表明苏联实际上是接受了美国的观点,也间接支持了以色列的立场。

(二) 在对中东的政策上,由对等平衡外交转变为加强以色列军事优势的威慑平衡外交。从国务卿罗杰斯与负责近东和南亚的助理国务卿西斯科,到尼克松和基辛格负责中东事务,美国的中东政策经历一个变化过程。在罗杰斯负责中东问题时期,美

国对阿以双方采取不偏不倚的对等外交政策,但这没有得到白宫的有力支持,致使罗杰斯在处理阿以冲突问题上步履维艰。1970年9月约旦危机之后,美国逐渐加强了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美国对中东的政策也由原来的对等平衡外交逐步向加强以色列军事优势的威慑平衡外交转变。1971年7月,罗杰斯提出的临时协定计划的失败,宣告了罗杰斯和斯科主导美国中东政策的终结。此后,美国对中东的政策开始由尼克松和基辛格执掌。[8](P143-144)尼克松-基辛格的中东政策是加强以色列的军事优势,以遏阻阿拉伯国家发动战争;同时要求以色列放弃先发打击,以维持阿以现状。

从美国对中东危机的政策来看,美国的目的是排挤苏联在中东的势力,在保证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优势而又劝阻以色列发动先发打击的同时,又安抚阿拉伯国家,以免阿以冲突升级。美国的这种离岸平衡政策,是为了保持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既反映了美国对缓和的认知,也影响了美国解决中东危机的方式及进程。

二、苏联对缓和的认知

影响苏联缓和观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和平共处思想。作为苏联长期以来一直力图实现与西方国家进行交往的重要理念,和平共处思想对苏联外交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也是苏联采取缓和政策的历史与思想原因[9](P73-76);二是中美关系。1960年代末中苏关系的破裂,使苏联视中国为威胁,而中美之间的接触更引起了苏联的关注。因此,试图通过对美缓和以阻止中美关系发生不利于自己的发展,也是苏联采取缓和态势的动因之一[10](P146);三是苏联对核武器、自身核力量的认知。2009年9月11日,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公布的冷战期间有关苏联核政策的材料显示,苏联对核武器、核战争及自身力量的认知,也是推动苏联采取缓和、影响苏联对缓和的认知的重要因素¹。

19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对核武器的破坏性、自身核力量的限度及美国对苏首先实施核打击的后果等方面都有较为清醒的认识。1972年,苏联在一次军事演习中模拟了美国对苏联的首次核打

击,情况简报显示:美国的核打击将会导致八千万苏联人死亡,85%的工业生产能力遭到破坏,并对其他军事设施造成巨大毁坏。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对此极为震惊。苏联的政治及军事领导人意识到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认为要不惜任何代价来避免使用核武器和发动核战争[11](P23-24)。同时,苏联对美核力量的战略劣势,加之苏联无法确保在美苏核战争中取胜与对美国发动先发打击的恐惧,及其对核威慑的严重依赖,都使苏联本能地避免原子战争,防止美国对其军队和领土使用核武器。这些因素都促使苏联与美国搞对等关系[11](P2-3, P27-29)。因此,从解密的材料来看,苏联对核战争的后果、对自身核力量与安全等方面的认知是苏联采取缓和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对苏联的缓和观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这不仅可以解释苏联对美缓和的动因,而且也可以从中解释苏联在与美核对抗中退缩的原因。

鉴于对自身军事实力与国际政治环境的认知,苏联力图在军事与政治两个方面与美国进行合作:军事缓和主要是战略武器限制与北约和华约军队的减少问题;而政治缓和则是在政治、经济与科学方面的合作问题。在美苏缓和过程当中,尤其是在两个超级大国缓和的高潮期,苏联的确试图在这两个方面达成共识。这是苏联对缓和的一个方面的理解。但如同美国对缓和的理解一样,在苏联对缓和的认知中也包含着竞争与争夺的含义。苏联认为,“缓和,其首要的含义应当是克服‘冷战’而将国家间关系转向正常与平等。缓和意味着不是通过武力、威胁和战争恫吓而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在会议桌上来解决分歧与争端,缓和意味着一定的信任及对另一方的合法利益的考虑”。但其实施不能以牺牲国家利益或践踏国家主权为代价,即缓和的实施是以不损害国家利益和主权为前提的[11](P2)。勃列日涅夫在1971年苏共第24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尽管也提出缓和与美国的关系符合两国的利益,两国关系的改善也是可能的,但依然对这种关系持怀疑态度,并仍将美国作为最主要的对手[12](P46-47)。因此,虽然苏联认为缓和是苏美之间的新型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联主动将这种关系置于追求美国认

¹ 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于2009年9月11日公布了关于苏联核政策的材料,该材料是美国五角大楼军火承包商BDM公司于1995年在对前苏联的国防部官员、军事专家等人员进行采访的基础上形成的,并最终形成两卷本的《苏联的意图:1965-1985》口述史料。参见William Burr and Svetlana Savranskaya, eds., “Previously Classified Interviews with Former Soviet Officials Reveal U. S. Strategic Intelligence Failure Over Decades”,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September 11, 2009. <http://www.gwu.edu/~nsarchiv/nukevault/ebb285/index.htm>.

可的义务之下,苏联从来不认为缓和是一项具体协议或一系列协议,也不是一个联盟;缓和意味着提供一个两国能寻求共识的框架,提供一种能有助于政治磋商而不受战争威胁的环境,能够使双方更准确把握彼此的利益与意图,但缓和不应应对苏联的政策加以限制^[10](P145-147)。由此可见,苏联对缓和的认知,不惟包括苏美之间的谈判、对话与合作,也包括在缓和框架下的争夺与竞争,所不同的是这种竞争与争夺需要双方的克制与协商。

1970年代,苏联在中东的目标是要加强同美国在中东的争夺,利用阿以冲突加紧对中东地区进行渗透;而在对盟国的支持方面,则既要一定程度地满足他们的要求,又要防止因此而引起美苏的直接对抗。从1967-1973年,苏联在阿以冲突中采取了双重路线政策:第一条路线是重建埃及和叙利亚的军事力量,以使它们能够对以色列的进攻进行威慑或自卫,这也有利于增强阿拉伯国家在与以色列进行政治谈判时的地位。第二条路线是苏联拒绝提供给阿拉伯国家进攻性军事武器,特别是能够使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发动进攻的地对地导弹与先进的战斗轰炸机;而且,在1967年后被派往埃及、叙利亚的苏联顾问与技术人员,实际上保持着对一些最先进的武器的控制,并对当地的军事力量进行管束^[13](P560-567)。从苏联在中东地区的政策来看,苏联一方面通过加强对盟国的援助而增强埃及的实力,以确保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对受援国进行约束,以防止阿以冲突升级而引发美苏对抗,破坏美苏的缓和局面。因此,在苏联对美国和阿拉伯国家的政策中,缓和起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三、美苏缓和与阿以冲突

尽管美苏采取缓和的出发点不同,目的各异,但在对缓和的基本认知上却彼此心照不宣:通过谈判而非武力解决争端;在尽量避免两大国直接对抗的前提下,争取有限合作;同时,双方不放弃、甚至强化对盟国的支持与在不同领域的争夺与竞争。自1967年六日战争以来,美苏双方都加强了对各自盟国的支持力度,斋月战争之前的阿以军备竞赛,也实际反映了美苏对缓和的认知及各方的意图:苏联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武器的主要意图是维持其在阿拉伯国家的地位,同时借此维系阿以之间的军事平衡;而美国则认为只有保持以色列在军事上对阿拉伯国家的绝对优势,才可以威慑其阿拉伯邻邦,从而制止战争的爆发。尽管美苏都不断向自己的盟国提供军事装备,但从整个事态的发展来看,双方都不希望阿以

发生新一轮的武装冲突而引发美苏之间的直接对抗。甚至基辛格在获知埃及和叙利亚要在六小时内进攻以色列时,仍致电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希望美苏能够对各自的朋友进行约束,防止发生任何先发打击;同时,基辛格警告以色列不要进行先发打击^[14](P1)。美苏对缓和的认知与追求,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两国均主张维持六日战争后、尤其是在1970年9月约旦危机之后的阿以对峙局面,标志着美苏缓和和高潮的1972、1973年的首脑会晤对中东问题的会谈就体现了这一点。

美苏《相互关系原则》,是1972年5月美苏首脑会晤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该文件为美苏缓和确定了基调:美苏两国和平共处;通过谈判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分歧,限制军备、防止核战争;美苏对于消除引起国际紧张局势的冲突具有特殊责任;加强政治、经济与科技等方面的合作;其中还规定,该文件不影响此前美苏对其他国家所承担的任何义务^[15](P633-635)。该文件既为美苏缓和规定了基本的原则,也为美苏在处理中东问题上提供了周旋的余地。事实证明,这既没有妨碍两国在中东问题上达成共识,也没有限制美苏向各自的盟国供给武器。5月26日下午,美苏会谈的主题转入中东问题。勃列日涅夫针对以色列拒不执行联合国242号决议以及阿拉伯国家的愤恨,认为美苏应当共同努力来解决阿以冲突,达成一个解决阿以冲突的方案。但尼克松认为,以色列之所以不执行安理会决议,是因为得不到安全保证,而在美苏会谈中也不可能强加给以色列一个解决方案;况且在六日战争后,美国能够对以色列施加影响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尼克松表示,在美国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既满足阿以双方要求、又能永久解决冲突的方案之前,在阿以冲突问题上应保持冷静;而在1972年大选之前他也不会解决这个问题。尼克松建议,对于解决阿以冲突的基本原则问题由基辛格多勃雷宁通过特殊渠道来解决;而对于阿以冲突则尽可能维持现状。勃列日涅夫对此表示同意^[16](P1128-1138)。在这次会晤中,尼克松对中东冲突的主旨思想就是要维持现状,而苏联想通过与美国联合一举解决阿以冲突的意图,一方面与美国本身的考虑相左,一方面也忽略了阿以双方的要求,而使得苏联的方案变得缺乏可行性。美苏第一次缓和会晤在中东问题上达成的维持现状的共识使萨达特感到,要解决阿以僵局就必须制造新的危机迫使美苏进行干预^[17](P531-532)。

1973年6月第二次美苏首脑会晤的主要内容

是缓和、合作及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中东问题并非双方的重要议题。事实上,中东问题仅在6月23日即苏联访问团离开美国的前一天深夜才谈及。在这场令美国领导人疲倦的讨论中,勃列日涅夫一再提醒美国,苏联的盟国愈来愈难以驾驭、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大,但这却未引起尼克松和基辛格足够的注意^[18] (P283)。基辛格认为,以色列军事力量强大,而美国又掌握着解决阿以冲突的锁钥,因此苏联的警告是想利用尼克松陷入水门事件而对美国发出的战争威胁,以达到其不付出任何代价而解决阿以僵局的目的^[19] (P298-299)。然而从事态的发展来看,这显然是基辛格对苏联警告的误读。而苏联尽管意识到中东战争的迫近,但却没有提出减少中东爆发战争危险的合理化建议,仍希望与美国合作而迫使以色列接受苏联所支持的阿拉伯国家的和平条款,即以色列要获得安全保障就必须从所有占领领土中撤退,显然美国对此是断然不会接受的^[18] (P284-285)。因此,在第二次美苏首脑会晤中,双方除了表示对“中东局势的深度关切”外,并没有对中东问题达成任何解决阿以争端的实质性共识^[5] (P615)。第二次美苏首脑会晤对中东问题的漠视,使希望通过大国干预来政治解决阿以冲突的埃及总统萨达特尤为失望^[20] (P101-102)。自1972年7月驱逐苏联顾问后,尽管萨达特认为在美国1972年总统大选后采取军事行动是打破中东僵局的唯一方法,但事实上他仍对通过美苏介入而实施政治解决抱有一线希望,然而美苏第二次会晤对中东问题的态度却使萨达特彻底放弃了这种思想^[21] (P204-205)。

1972年5月美苏会晤中对中东问题的态度,使萨达特决心通过战争使两个大国更深地卷入中东危机;而1973年6月的第二次美苏首脑会晤,则使萨达特彻底放弃了通过美苏,尤其是美国来促进中东和平的思想。从美苏缓和与中东危机发展的进程来看,美苏缓和实际上成为促发1973年中东战争的外源性因素。

四、埃及追求缓和的失败

1967年11月22日,安理会通过了第242号决议,以解决阿以冲突问题。但这份旨在希望阿以双方都能接受的决议,却在措辞上引起了阿以双方的长期争论,以致阿以冲突并未因此而结束。埃及总统纳赛尔曾试图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阿以冲突,但由于阿以双方在领土等问题上分歧较大,通过和平方式来弥合分歧、全面解决冲突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为打破政治上无法解决阿以冲突的僵局,纳赛尔在

1969年3月至1970年8月间发动了对以色列的“消耗战”^[22] (P151)。为结束埃以之间的“消耗战”,1970年6月,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联合国242号决议的基础上提出了“罗杰斯计划”。埃及发动的消耗战在消耗以色列的同时却在更多的消耗自己,而罗杰斯计划为阻止埃及遭受灾难性的军事损失提供了机会,甚至有可能因此而阻止美国向以色列提供更多的鬼怪式飞机,因此纳赛尔接受了该计划^[23] (P58)。尽管后来以色列也接受了该计划,实现了埃以之间的暂时停火,但这种局面不久便被打破。因此,从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到1970年9月纳赛尔去世,实际上埃及在政治与军事方面均未能实现其收复失地等目标,也没有在解决阿以冲突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随着消耗战的结束及纳赛尔的去世,打破阿以僵局的任务留给了继任总统萨达特。

萨达特上任后,为打破阿以不战不和的僵局进行了政治和军事两手准备。在任副总统期间,萨达特就领教过苏联对埃及军事援助的出尔反尔,因此在他担任埃及总统后,对苏联的援助承诺所报希望不大,与苏联的关系也较为紧张^[24] (P62-78)。同时他也深知,仅靠埃及的军事力量是无法将以色列驱逐出西奈半岛的^[25] (P37)。因此,萨达特改变了纳赛尔依靠苏联来打破僵局的方式,转而尝试通过缓和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来打破阿以之间的僵局。

萨达特首先向美国发出了缓和的信号。1970年10月1日,萨达特向前来参加纳赛尔葬礼的美国代表团表示,他希望开启美埃关系的新篇章。但萨达特的这次意在改善美埃关系的试探,并没有得到美国的积极回应^[25] (P36)。在此后的两年里,即从1971年到1973年斋月战争前,由于基辛格专注于解决越南战争及中美关系;尼克松忙于美苏首脑会晤及准备1972年大选等原因,致使美国在中东的外交一度处于一种异乎寻常的静默与消极状态,甚至萨达特总统于1972年7月驱逐在埃及的苏联顾问,也没有引起美国对其外交政策的重新评估,这导致了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失望^[8] (P129)。此外,为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埃及还于1972年4月开通了与白宫的秘密通道,萨达特试图通过这条通道更深入地了解美国的意图,以在解决阿以冲突问题上尽可能地获得美国的支持^[26] (P1293-1296)。但事实证明,无论是美埃之间的正常外交途径还是秘密通道,都没有给埃及带来更多打破阿以僵局的希望,萨达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哈菲兹·伊斯梅尔与美国多次会谈的结果就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萨达特正处于一个两

难境地:要全部获得以色列所占领土是不可能的,但如果背离这个目标,就会使自己在阿拉伯世界陷于孤立;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要获得和平就要让步,但1967年战争的失败所带来的羞辱与挫折又不可能让步。1973年2月23日伊斯梅尔出访美国的目的,即在于探寻美国对埃及方案的态度,以解埃及的困境。尽管尼克松认为以色列应为解决冲突作出让步,但他认为阿拉伯国家也应为此让步;美国不能背叛自己的朋友,而且美国能够压以色列解决阿以冲突的能力也极为有限。在伊斯梅尔随后与基辛格的会谈中,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共识^[19](P210-216)。同年3月,伊斯梅尔在巴黎再次会见基辛格,基辛格表示美国不能确保埃及对西奈半岛的主权,结果双方不欢而散^[23](P67)。5月20日,伊斯梅尔与基辛格在巴黎再次进行会谈,以进一步探寻美国的意图。伊斯梅尔没有得到美国的任何承诺,相反基辛格却试图说服伊斯梅尔接受美国的逐步解决方案^[27](P1-5)。这是斋月战争前基辛格和伊斯梅尔的最后一次会谈,由于埃及不会改变自己的既定立场,而美国也不会改变其对阿以冲突的政策,这次毫无结果的会谈,标志着萨达特对美缓和外交的失败^[28](P30-31)。

萨达特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阿以冲突的另一项尝试,是希望与其对手以色列进行缓和。尽管萨达特在公开场合谴责以色列,但他还是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来打开僵局。1970年12月,萨达特通过美国向以色列转达了他的建议:如果以色列从整个西奈撤军,他将考虑与以色列达成协议。作为这个建议的一个阶段,萨达特希望通过以色列的部分撤军来阶段性收复失地,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也希望通过部分撤军能获得一个临时协议,而双方的出发点都是避免战争,但这遭到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的坚决反对。1971年2月4日,萨达特公开表示,如果以色列能够从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所有被占领土中撤退,埃及将会承认以色列。作为阿以全面和解的第一步,萨达特提出了以色列军队部分撤退及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的建议,但以色列仅对建议中的运河的重新开放感兴趣。梅厄让以色列驻美大使拉宾就重开运河问题征求基辛格的意见。梅厄想当然地认为,由于美国深陷越南战争而且苏联有使用运河的意图,美国不会同意。基辛格却认为,只要运河的重开有利于中东的稳定,以色列就应予以考虑,但梅厄并未因此而对萨达特的建议采取积极的行动。从1971—1972年,梅厄不接受临时协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基辛格不会将其影响力和时间用在埃以

之间艰难的谈判上。事实上,中东的现状也未使以色列感觉到真正的威胁,因此,只要阿以冲突没有恶化到必须要改变的程度,美国和以色列是不会强行促进一个新的外交方案的^[23](P59-61)。以色列的态度实际上是拒绝了萨达特的提议,这表明埃及对以色列缓和的失败。

随着对以色列缓和的失败,与美国缓和外交的毫无结果,美苏首脑会晤对中东现状的认可,从1972年至1973年,陷入外交僵局的萨达特认为,军事选择是确保美国进行政治干预与便于谈判的必要条件。为此,萨达特取得了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的支持,他答应以石油为武器来反对美国。军事行动方面,萨达特转向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尽管由于双方目标的不同而合作基础薄弱,但在共同作战方面取得了一致^[29]。在1972年9月驱逐了苏联顾问而消除了苏联对埃及的束缚,1973年取得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及苏联的军事援助后,埃及与叙利亚于1973年10月6日发动了对以色列的战争。

第四次中东战争既是美苏缓和的产物,也是阿拉伯国家长期要求收复被占领土的结果。美苏缓和的确缓解了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为双方的意图提供了一可供参考的框架,但同时将阿拉伯国家对领土的要求牺牲在了缓和的祭坛之上。从1971—1973年,美苏既没有对解决阿以冲突的方案进行有力的推动,也没有在美苏两次首脑会晤中就解决中东危机达成富有见地的共识,而维持了阿以不战不和的现状,这成为引发战争爆发的外源性因素。埃及试图通过缓和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打开阿以冲突的僵局,但无论是公开途径还是秘密通道,埃及与美国的缓和外交均毫无结果。由于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对阿拉伯国家的完胜、军事实力上的优势,以色列具有了对阿拉伯国家的心理优势,这使得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采取了强硬态度,反对全面解决阿以冲突。外交上的失败,以色列的强硬及收复被占领土的需求,构成了埃及发动斋月战争的内源性因素。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促使萨达特决心通过战争来解决阿以争端,以此将美苏卷入中东冲突,引起美苏对中东更多的关注,最终实现阿以冲突的政治解决。

参考文献:

- [1] Vladimir Petrov, US-Soviet Dialogue: Past and Future,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75.
- [2]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3] Phil Williams, “ Detente and US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1, No. 3 (Summer, 1985).
- [4] Public Papers of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ichard Nixon 1969,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1.
- [5] Public Papers of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ichard Nixon 1973,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 [6] Henry A.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 [7] Henry A. 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9.
- [8] William B. Quandt, Decade of Decisi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he Arab – Israeli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 [9] Richard Pipes, U. S.-Soviet Relations in the Era of Detente,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1.
- [10] Adam B. Ulam, Detente under Soviet Eyes, Foreign Policy, No. 24, Autumn 1976.
- [11] John G. Hines, Ellis M. Mishulovich, John F. Shull, Soviet Intentions 1965– 1985 Vol. I. An Analytical Comparison of U. S.- Soviet Assessments During the Cold War, BDM Federal, Inc. Sep. 22, 1995. pp. 23– 24. [2009– 09– 21] http://www.gwu.edu/~nsarchiv/nukevault/ebb285/doc02_I_ch3.pdf.
- [12] 辛华.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Z]. 北京: 三联书店, 1976.
- [13] Jerome Slater, “ The Superpowers and an Arab-Israeli Political Settlement: The Cold War Year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5, No. 4 (Winter, 1990– 1991).
- [14] NPMP, NSCF, Box 664, Middle East War Memos & Misc October 1– October 17, 1973.
- [15] Public Papers of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ichard Nixon 1972,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4.
- [1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 1969 – 1976, Volume XIV,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6.
- [17] Coral Bell, “ A Case Study in Crisis Management During Detent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0, No. 4 (Oct., 1974).
- [18] Anatoly Dobrynin, In Confidence: Moscow’s Ambassador to America’s Six Cold War Presidents (1962 – 1986),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5.
- [19] Henry A. Kissinger, Years of Upheaval, Boston: Little, Brown, 1982.
- [20] William B. Quandt, Peace Process: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Since 1967,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5.
- [21] [埃及] 穆罕默德·海卡尔:《通向斋月战争之路》[M], 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译组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
- [22] Yaacov Bar Siman Tov, Israel, the Superpowers, and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Praeger, 1987.
- [23] Kenneth Stein, Heroic Diplomacy: Sadat, Kissinger, Carter, Begin, and the Quest for Arab-Israeli Peace,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24] [埃及] 安瓦尔·萨达特. 萨达特回忆录[M]. 辛华译. 北京: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8.
- [25] Richard B. Parker ed., The October War: A Retrospective, Florida: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1.
- [26] Henry A.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9.
- [27] NPMP, HAKO, Box 132, Egypt/Ismael, Vol. VII, May 20– September 23, 1973.
- [28] RG 59, Records of Henry Kissinger, Box 25, Cat C Arab– Israeli War.
- [29] William Burr, ed, “ The October War and U. S. Policy”,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Oct. 7, 2003. [2009– 09– 21] <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98/index.htm>.

责任编辑: 杨春梅

D tence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Middle East War in 1973

Liu He bo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Modern World in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Detente was the special phase of the Cold War. American and Soviet polici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process on resolving the crisis were influenced by their perception on detente. Not only was the outbreak of the Middle East war in 1973 relevant to American-Soviet perception and propulsion on detente, but also to Egyptian questing for detente. American-Soviet tension was relaxed by the detente, but both Egypt’s endeavor for detente with America and Israel, and Arabian states’ appeal to the territory occupied by Israel were ignored, which were the external factors catalyzing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Because both Arab-Israeli deadlock maintained by U.S. – Soviet detente and Egypt’s failure in diplomatic attempt, as well as Israel’s rigid posture, Sadat was compelled to wage the fourth Middle East war.

Key words: Detente; Arab-Israeli Conflict; Ramadan War; Cold War